



全球化中的中华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

廖建裕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华裔馆, 新加坡 637721)

[关键词] 华人研究; 移民研究; 全球化; 中华移民; 新移民; 移民国家; 原住民国家

[摘要] 论文从移民的背景、动机与动向等方面比较了近代与当代新老中华移民的异同; 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华移民在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洲与新加坡等“移民国家”与东南亚“原住民国家”的不同情况及其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和对当地华社的冲击; 探讨了新移民研究的现状及其对当代华侨华人研究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2) 01-0001-17

Chinese Migrants in a Globalized World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Heritage Center,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7721)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migration studies; globalization; Chinese migrants; new migrants; nation of immigrants; nation of indigenous inhabitants

Abstract: While Chinese migr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the greatest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recent waves of migration that started around the late 1970s and have continued to go upward up to today. From a Southeast Asian scholar's perspective, the author first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ld migrants and the new ones, including their economic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s, motives, intended destinations, and migration channels. Based on this comparison,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s of Chinese migration. The author then further compares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new Chinese migrants are confronted with and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they have made in nations of immigrants such as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and nations of indigenous inhabitants such as Malaysia, Indonesia,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Finally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research work done by scholars abroad and in China and provides his advice.

[收稿日期] 2011-12-31

[作者简介] 廖建裕, 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会长, 主要从事东南亚华侨华人、东南亚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 本文系笔者于2011年12月27日在“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讲座系列”(首讲)所发表的题为“中华在境外: 全球化中的移民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演讲的修订稿。该讲座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办。在此, 笔者要感谢北京大学吴小安教授的邀请, 使笔者有机会与大陆学人进行交流。

在本文中，笔者使用了一些海外学者较常用的“华文”词汇，大陆学者可能不太熟悉。为了减少误解，有必要作一些解释。在此，“中华”是文化与族群的概念，而不是“国家”的观念，主要指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华人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后裔。这个意义上的“中华”概念，最早可能是由王赓武教授首先使用的。^①周南京教授也曾用“境外”一词表述中国国境以外的国家和地区。^②有鉴于此，笔者也试图用“中华”一词来概括中国大陆以及大陆以外的华人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后裔，而用“境外”表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与国家。谈到移民时，笔者用“中华移民”而不只用“中国移民”，以便能概括中国境外的华人移民，包括港澳台的移民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海外华人”。当笔者用“中国移民”时，一般指的是历史上的中国或者是现在的大陆的移民。然而，在东南亚地区，“华人移民”或“华族移民”的用法较为普遍，其意义相当于“中华移民”，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也加以应用。在中国大陆，“华侨华人”有很明显的“国籍”分别，所以一般都用“华侨华人”来概括中国籍与外国籍的中华族群。可是在东南亚，尤其是新马一带，“华人”一词是指拥有所在国国籍以及久居当地的中华族群及其后裔，这些族群有些可能还拥有中国国籍（即大陆所指的“华侨”）。这些习惯上的用语，与大陆学者可能有些差异，故此先予以说明。

在中国境外，尤其是笔者工作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近年来有不少关注中华移民，包括新移民的研究。在华裔馆与其他学术机构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也常以中华移民作为其中的一个课题。^③通常我们邀请世界各地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之后将论文筛选，汇集成册出版。^④本文实际上就是以这些会议论文以及有关出版物为基础所做的简略的报告，^⑤加上笔者自己的研究和不很成熟的意见，与各位同仁分享交流。

本文旨在简要地讨论近期的中华移民，尤其是新旧（老）移民的异同；吸纳国对中华移民的政策，新移民对于吸纳国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的影响；最后涉足新移民研究的一些问题及其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关系。

一、近代与当代中华移民

论及正题之前，笔者需澄清如下几点：在谈到新移民时，笔者并没有严谨的概念，没有将它局限于“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而是把港台的移民也列入其中；此外，还把

① 请参阅王赓武《离乡别土：境外看中华》，傅斯年讲座2005，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此外，书中“境外”一词也不局限于港澳台地区，因为他是从东南亚华人（境外）的视角探讨中华民族的族群与文化（中华）。

② 请参阅周南京主编《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

③ 如华裔馆联合举办的三次国际会议：2006年的“全球化中的东南亚华人文化”、2007年的“华人移民比较研究：适应与发展”以及2010年的“迁移、本土化与交流：从全球的视角看海外华人”，其中2010年的会议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

④ 已出版的论文集包括：*Chinese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华人移民比较研究：适应与发展》(2010)；*Migration,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Chinese Overseas and Globalization* (2011)；《华人移民与全球化：迁移、本土化与交流》(2011)。有些论文则发表在《华裔馆通讯》(CHC Bulletin)上。

⑤ 本文有部分内容取自笔者以下几篇英文稿：Leo Suryadinata, “Chinese Migration in the Globalizing World: A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CHC Bulletin*, issues 13 & 14, 2009, pp. 1-7;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Some Comparisons”, in Leo Suryadinata, ed., *Chinese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gapore, 2009, pp. 68-77; Leo Suryadinata and Goh Yu Mei,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Developed Migrant States: Five Case Studies”, *CHC Bulletin*, issues 16 & 17, November 2010 and May 2011, pp. 1-8.

“迁移”与“移民”并用，甚至也把留学生列入移民的范围之内，因为即便不是“真正”的移民，只要居留时间长，与吸纳国的族群有某种程度的互动，他们就会对吸纳国产生一定的冲击；本文提到的中华“新移民”，也包括“非法移民”。

我们所知道的“移民”在中文中其实是较新的概念。王赓武教授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书中，“移民”是动词，是指在中国境内，由国家（政府）将一群人由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后来，“移民”一词才应用于中国境外。即使如此，其意义也与西方国家有别，它不是真正的“移民”，而是“侨居”（sojourn）。^[1]当事业有成或者发了大财，就要回乡，所谓“衣锦还乡”，所以“移民”不是永久性的。这可能就是“落叶归根”的概念。这个概念与印尼米南加保人的 merantau 很相似，即离开故土谋生，最后还是要回到故乡。然而，对当时的中国移民来说，经常是事与愿违，特别是在早期，由于交通不便，又有国家禁令，要回到故乡不易。许多移民因此常在异乡结婚生子，结果变成了“落地生根”。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与早期的移民有别，他们不再是落叶归根，也不是落地生根，而是“浮萍无根”，为了寻找更理想的居住地而到处“漂泊”。这些“理想”的居住地往往是在发达的东西方国家，尤其是后者。这种移民的目的有一点像“良禽择木而栖”。有人说，这是“人性”，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民族国家观念强盛的亚洲，归属感依然是极为重要的。为什么新移民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且让我们看看近代与当代的中华移民。

中华移民的历史悠久，然而，在本文中，笔者只想探讨两次近期的中华移民。第一次是近代移民浪潮，即19世纪末叶以及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当代移民浪潮，即20世纪末叶以及21世纪初期，这一次的移民浪潮至今依然持续。这两次移民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在近代移民时期，那时中国人口众多，政治动乱，内忧外患，贫穷饥饿，民不聊生。然而，当代的移民浪潮却不相同，这时的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逐渐好转，并且开始起飞。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移民，不再是由于饥饿与贫穷而出国，而是为了在国外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改善自己的经济情况。留学生人数激增，专业人士出国，在大陆累积财富者也纷纷出外投资，不少年轻人也到国外闯天下，实现发财的美梦。应该指出，当代的中华移民，并不只是由中国大陆新移民组成，港澳台也有为数不少的移民；这些移民比大陆新移民要早一些，但是，由于其移民时期与大陆新移民有重叠，因此也将他们列入新移民的行列。虽然如此，港澳台移民与大陆移民还是有不少区别。前者移民是由于他们对自身的前途与安全有顾虑，所以移民动因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而大陆新移民绝大部分是经济移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华移民，一般而言教育程度都比较低，绝大部分都是劳工和小商人。他们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一般都受过较高深的教育，有一些甚至是专业人士；也有一些是留学生，他们在学成后，往往就在西方国家定居。如果说旧移民一般都出身于贫困家庭，而且是农业的背景，那么新移民中则有不少是商务移民，他们带着资本定居国外，受到需要资金的国家的欢迎；技术劳工的移民也相当普遍，许多国家如新加坡有一个时期就很欢迎这种移民。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中华移民，多数来自中国南部省份，特别是侨乡。然而，新移民的来源地却不局限于侨乡，而是囊括整个中国大陆。此外，香港、澳门与台湾的移民尤其显著，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某一段时间内，这些港台移民，往往成为商务移民与留学生的主要来源。

旧移民的目的地是在东南亚国家，只有少数前往欧美各地；而新移民的目的地，则是东西方的发达国家。他们的要求也与旧移民不同，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能够如此做是因为他们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同时在全球化的年代里，交通异常发达，人口的流动益加频繁。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19 世纪末的旧移民由于交通困难，往往无法从一个地方方便地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虽然有少数人返回中国，但是绝大部分的旧移民居留在他乡，落地生根。其实，在东南亚各地，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谓土生华人社群的存在。当时由于中国妇女移民国外的人数少，所以男性移民纷纷与当地妇女或者与土生华人妇女通婚，他们及其后代组成了“土生华人”社会。这个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较稳定的族群。当时的新移民，也很快地融入这个侨生社会里，变成了其中的一分子。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的移民，由于人数多，且有中国妇女前来，因此他们不再融入土生华人社会，而是形成另外一个“新客华人”社群，在文化上与土生华人有别。不过，即便是新客华人，在东南亚住久了，也开始本土化或在地化。新客华人与土生华人也有通婚的现象，无形中形成一种本土化的华人社会，虽然“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并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在东南亚一带，由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兴起，土生华人与旧移民华人社会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们适应新的环境，逐渐变成了在地国的国民。正因为这样，旧移民，尤其是他们的子女，就比较显著的本土概念。他们往往认同于所在国，在文化上有不同程度的本土化。这样的情况在“原住民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明显。

新的中华移民，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移民，由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经验，所以就没有落地生根的念头。再加上，在全球化的时代里，移民与再移民似乎变成了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形成了这种漂泊不定的移民形态。这样的现象可能在东南亚某些国家较为明显，也往往使新移民与旧移民（及其后代）之间产生摩擦与冲突。

说到新移民，台湾最早，香港次之，大陆较迟。1999 年之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人数激增，而来自台湾与香港的新移民急速下降。有关中国新移民的人数，未有官方的数字。根据庄国土教授的估计，2006 年，全球的中国新移民约有 600 万人，其中 460 万源自中国大陆，70 ~ 80 万来自香港和台湾，69.9 万是正式的劳务人员。^[2] 这些移民可以分成以下四个类型：即留学生及其家眷、以家庭团聚为主的普通移民、投资移民和商务移民、非正式渠道移民。^[3] 至于海外留学生及其家眷的人数，大陆占总数的 25%，而香港和台湾则占 50%。

应该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商务移民的人数在激增。根据中国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公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当前中国有 50 万拥有 1000 万元（约美金 156 万元）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富豪，其中有 60% 的富豪正在考虑移民，或正在办理手续，或已经移民。他们的移民目标是发达国家：即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及新加坡。^[4]

庄国土教授也估计，这为数 600 万的移民之中，前往发达国家的大约有 80%，到发展中国家的约有 20%。^[5] 这与早期的移民模式迥然有别，早期的移民有 90% 移入到东南亚。笔者认为，新移民模式的改变，除了上述的几个原因外，跟“原住民国家”与“移民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有密切关系。原住民国家与移民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方式，一般都会限制移民的涌入；而后者则采取打开门户的方式，欢迎外来移民，尤其是有经济能力与专长的新移民，以便能够为在地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而不是成为国家的负担。这些新移民的到来，对移民国家与原住民国家的社会与经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与影响。

二、“移民国家”与“原住民国家”的新移民

虽然将世界各国简单地分为原住民国家与移民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原住民国家都是一样的，也不是说所有移民国家都没有差别。不过，原住民国家有一个特点，即所谓“原住民”在这类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移民国家也有其特点，即占主导地位的是移民而不是“原住民”。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很多是“移民国家”，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则多数是“原住民国家”。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移民国家的情况。在此，选择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洲与新加坡作为例子。

(一) “移民国家”的新移民

二战后，加拿大政府对中华移民的政策进行了重大修订。在此之前，政府发布了限制甚至禁止华人移民的条例，同时也限制已经在加拿大的华人的各种权益。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政府逐渐消除了这些歧视与障碍。从1967年开始，加拿大政府实行了评分制度（point system），中华移民可以在此基础上与他族移民竞争进入加拿大。自那时候起，加拿大的华人人数激增。

表1 加拿大华人人口情况表

年份	加拿大总人口	加拿大华人人口	本土出生 (%)	华人占加拿大人口比率 (%)
1971	21 961 999	124 600	-	0.57
1981	24 820 393	285 800	-	1.15
1986	26 101 155	412 800	-	1.58
1996	29 610 757	922 000	-	3.11
2006	32 623 490	1 347 000	23.0	4.13

资料来源：Peter Li,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n Canada”, in Huping Ling ed. *Asian America: Forming New Communities, Expanding Boundarie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29; Statistic Canada, <http://www.statcan.gc.ca/pub/98-487-x/4151287-eng.htm#table3>; <http://www.statcan.gc.ca/pub/89-621-x/89-621-x2006001-eng.htm> (accessed 5 January 2012).

从二战后到1990年，中国大陆并不是加拿大华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大多数的华人移民来自香港，最高峰时，其人数竟达4.4万人（1994年）；2000年之后，每年的移民人数则少于2000人。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口逐年增多，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情形更加显著。这是由于加拿大实施了一项特别的政策（OM-4S-336），给予中国留学生以及访问学者政治庇护。在这一政策下，中国留学生、学者及其家属都能取得在加拿大的居留权。除了在1991—1994年以及2001—2002年这两个阶段华人移民人数稍减之外，一般而言，加拿大的中华移民人数都是有增无减的。而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尤为显著，他们来自经济实力较强的阶层。

根据加拿大2006年的人口普查，69.8%的加拿大华人是移民，其中有59.5%是在1991年之后才移居加拿大的。这些新移民的到来，使教育程度高的华人移民大大增加，这也使华人社会的面貌大为改观，专业人士人数激增，而这些新移民也不住在唐人街，而是选择居住在郊外地区；尤其是华人较多的地方。虽然居住在唐人街的华人减少，但唐人街仍然持续发展与服务华社。不过，唐人街中的旧移民组织，其会员人数在下降，因为他们无法吸引新移民参加。

虽然旧移民仍然居留加拿大，但许多新移民却离开了加拿大。根据郭世宝博士（Guo Shibao）的研究，这与加拿大的经济情况有关，因为新移民并不能够在加拿大取得更高的经济利益。^[6] 这些新移民，有的再回到中国大陆。与加拿大不同，他们的学历与资格在中国大陆得到承认。这无形中给他们更多且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离开加拿大返国，是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学历，可以在别处找工作。由于他们在加拿大无法达到预期的移民目标，所以才再移民。郭世宝博士也发现，这些由加拿大回到中国的新移民，比他们在加拿大时和移民到加拿大前更快乐。

从1848到1882年间，中国人移民美国相对来说较为自由，不过，之后美国政府实行排华政策，结束了华人自由移入美国的时期。在二次大战期间，中国与美国结盟，所以在战后美国又落实自由的移民政策，欢迎中国移民。1965年，美国修改移民法案，允许中华移民进入美国，正式废除歧视有色人种的移民政策。虽然从70年代开始，中华移民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的比例依然很高。90年代后，情况则大为改变。1990年的数据显示，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华人占当地华人人口的69.3%；到了2006年，则有63%的美国华人是外国出生的。

表2 美国华人人口情况表

年份	美国总人口	美国华人人口	本土出生 (%)	华人占美国人口比率 (%)
1940	132,122,446	106,334	51.9	0.08
1950	152,271,417	150,005	53.0	0.10
1960	180,671,158	237,292	60.5	0.13
1970	205,052,174	435,062	53.1	0.21
1980	227,224,681	812,178	36.7	0.36
1990	249,464,396	1,645,472	30.7	0.66
2000	282,216,952	2,879,636	31.0	1.02
2006	299,398,484	3,565,458	37.0	1.19

资料来源 “Chinese American Population: Numbers and Nativity, 1940—2006”, Min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6; U. 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popest/data/historical/2000s/vintage_2006/index.html; <http://www.census.gov/popest/data/national/totals/pre-1980/tables/popclockest.txt> (accessed 5 January 2012).

中华新移民的到来,使美国的华社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根据周敏教授的研究,当地的旧移民跟新移民接触比较少,新移民组织自己的社团,与旧移民的社团分庭抗礼。旧移民的社团一般只进行社交活动,而新移民的社团则没有固定的会所,也没有严格的会员制度,而且往往是以电脑作为沟通的工具。^[7]旧移民社团有会员制度,对于会员的要求较为严格,并且拥有会所与产业。这两种不同的华人社团没有互动,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语言的隔阂。旧移民往往是操广东话;而新移民则讲华语(普通话)。此外,旧移民也不大欢迎新移民来分享他们的产业与传统。

从个人方面来说,新旧移民之间不同的文化往往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旧移民常常埋怨新移民不能够适应美国文化、融入美国社会。周敏教授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新移民也觉得自己了不起,认为旧移民对新移民具有强烈的偏见。^[8]

更重要的是,整个环境对于新移民融入主流文化还是很不利。一般的移民希望能够活得像美国人一样,能够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同时能够自由地追求他们的梦想。然而,许多新移民却无法实现他们所谓的“美国梦”,这是因为新移民不能够很好地掌握英语,同时他们在中国所受的教育跟所习得的技术不能够转移到美国。他们对于美国的环境也很不熟悉,无法与“主流社会”^①挂钩。许多新移民需要更辛勤地工作,以便能够达到他们移民以前所享受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来美国后却发现,他们在美国的地位反而大大地降低了。

像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一样,新西兰在最近才对中华移民开放。当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盟时,新西兰政府就面对着与英国在经济与政治关系上削弱的问题,其解决的方法就是废除以种族为基础的移民法令,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这个措施导致了新西兰亚洲移民的增加。1987年的移民法标志着新西兰废除了种族歧视。在这个法令下,移民是以移民本身的长处,而不是他的国籍或者是种族身份作为移上的依据。20世纪90年代,新西兰的移民法进一步改善。1991年,评分制度(point system)成为1991年移民法的基础。1995年,移民法再次修正,以方便具有技能的移民进入新西兰。

在这个比较宽松的移民法下,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利用这个机会申请进入新西兰。在2006年,

① 其实,“主流社会”不是学术名词,而是生活中与新闻报道中所常见的字眼,是 mainstream society 的直接翻译。有的是把主流社会当成是主导性的社会,主要是政治思想的主导,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主流社会;有的把主流社会当成是“多数族群”的社会,这是与“少数族群”相对而言的。在此,笔者把“主流社会”当成是“主导性社会”与“多数族群”社会。有关“主流社会”的讨论,请参阅拙文《探讨印尼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印尼焦点》第22期(2008年7月),第13~16页。

来自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华人新移民有 140 570 进入新西兰，这比 2001 年新西兰的华人人数增加了 40.5%，是 1986 年华人人数的 7 倍多。很显然，华人人口的激增是由于新移民的涌入所导致的。2006 年，当地 78.24% 的华人是在新西兰以外出生的。换言之，本土出生的华人仅有 21.76%。

表 3 新西兰华人人口情况表

年份	新西兰总人口	新西兰华人人口	华人占新西兰人口比率 (%)
1976	3,129,383	14,860	0.47
1981	3,143,307	16,653	0.53
1986	3,307,084	19,506	0.60
1991	3,495,800	37,689	1.08
1996	3,733,900	82,320	2.20
2001	3,887,000	105,057	2.70
2006	4,186,900	140,570	3.36

资料来源: Manying Ip and Nigel Murphy, *Aliens at my Table: Asians as New Zealanders See Them*, Auckland: Penguin Group (NZ), 2005, p. 6; 200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Dwelling (New Zealand); Statistics New Zealand, http://www.stats.govt.nz/browse_for_stats/population/estimates_and_projections/pop-indicators.aspx; http://www.stats.govt.nz/tools_and_services/services/schools_corner/activities/secondary/activity-future-population-growth.aspx; <http://web.archive.org/web/20090325030240>; <http://www.stats.govt.nz/NR/rdonlyres/5F1F873C-5D36-4E54-9405-34503A2C0AF6/0/quickstatsaboutcultureandidentity.pdf> (accessed 5 January 2012).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西兰原有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广东一带，然而在新阶段，新的华人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比如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各地。但是，中国大陆依然是新西兰新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根据李海蓉 (Phoebe Li) 博士的研究，1991 年以前，大部分的华人移民是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商人。^[9] 1991 年的移民修正法使更多来自大陆的移民涌入新西兰。此外，中国也开始落实自费留学中介服务，促使大批的中国学生流入新西兰深造。其实，来自中国的自费学生的人数从 2001 到 2006 年间每年保持在两万人以上的水平。与此同时，从 2003 年开始，新西兰政府修改其政策，允许国际学生在新西兰读书期间也可以打工，而毕业后也可以取得工作准证。此外，他们在申请居留准证时，也可以取得“优待分数” (bonus points)，以技术移民的类型来申请。Paul Merwood 博士在其 2007 年的论文中分析，来自中国的学生占新西兰所有学生移民的 32%，除此之外，新西兰也接受了人数极多的中国商务移民。^[10] 从 2000 年起，中国变成了新西兰商务移民的主要来源地。

这些中国新移民的到来，使新西兰华人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般说来，这些新移民拥有较高的学历，具有专业资格或者是商人身份。此外，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时，许多华人移民来到新西兰寻找更好的教育与工作机会。这与早期的移民由于生活所迫而被迫移民的情形大不相同。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移民提高了新西兰华人社会的教育水平。根据叶宋曼瑛教授的研究，在新西兰的族群中，华人如今拥有极高的教育水平，超越了新西兰的平均国民水平。除了教育水平的提高外，在语言方面也有显著改变。广东话曾经是华人的共同语言，然而绝大多数的新移民都说华语 (普通话)，一定数目的移民也能够掌握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言。

正如加拿大与美国的中华移民一样，新西兰的中华移民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之中许多人仍然很难找到工作，因为外国的学历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此外，当地社会对于华人仍然持有偏见。因此，虽然他们有专业学历，但也得被迫接受非专业的体力工作，或者是变成了自雇人士。其他则回到学校念书来提高英文水平，或者取得新西兰的文凭。这些移民中也有一些来自澳洲，他们在新西兰拿到专业文凭后再回到澳洲，有些则回到中国寻找更满意的工作。有不少回中国的

移民，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新西兰。他们则经常飞来飞去，穿梭于中国与新西兰之间，变成了“太空人”。

虽然如此，最近的中国大陆移民，特别是由学生变成移民的那些人，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因为他们是获得工作之后才到新西兰的。这些由学生变成移民的华人，也比较容易适应新西兰的社会生活，因为他们在变成移民前已在新西兰居留了一段时间。这无形中使新移民在新西兰的经济地位逐渐提高。

澳洲的情况也跟加拿大、美国与新西兰相似。由于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澳洲政府也修订移民法来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与技术工人移民澳洲。有一个时期，澳洲政府实施“白澳政策”，限制亚洲移民到澳洲，但后来摒弃了这个政策，致使澳洲的亚洲人人数激增。从1986年的196,347人增加到2006年的669,890人，有许多来自大陆的华人是拿学生入境证进入澳洲的。香港和台湾的移民，也以技术人员移民的方式进入澳洲，香港移民以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最多，台湾移民大部分是商业移民。除此之外，1989年，澳洲的中国留学生都获得了暂时居留证，并在1994年获得永久居留证。他们的亲属可以通过“家庭移民”项目来到澳洲，这无形中也增加了澳洲华人的数量。

表4 澳洲华人人口情况表

年份	澳洲总人口	澳洲华人人口	华人占澳洲人口比率 (%)
1976	14,110,107	36,638	0.27
1986	16,138,769	196,347*	1.30
2001	19,533,972	556,560	2.97
2006	20,848,760	669,890	2.64

资料来源: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DetailsPage/3105.0.65.0012008?OpenDocument> (accessed 5 January 2012).

* 1986年的数字包括27,206名混血华人(part-Chinese)，其他年代的数字是否包括混血华人则不详。

这些新移民的到来，也使澳洲华人族群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移民多数来自广东，新移民则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从1986到2001年，有更多的华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东南亚诸国，但澳洲的华人族群中，在澳洲当地出生的华人，其数量仍然是最多的。比如以1986年的数据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在澳洲出生的华人(21.6%)，其他依次为印度支那(18.8%)、马来西亚(15.4%)、中国大陆(15.2%)和中国香港(13%)。到了2001年，数量最多的仍然是在澳洲出生的华人(25%)，其他依次为中国大陆(24%)、中国香港(11%)、马来西亚(10%)和越南(7%)。可是，如果把在外国出生的华人移民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则在澳洲出生的华人实际上只占全澳洲华人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已。根据2006年澳洲的人口普查，来自亚洲的华人移民人口中，99,725人(32.7%)是在1991年前就来到当地的；而另外的205,310人(67.3%)则是在1991年之后才去的。这个数字不包括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

根据Christine Inglis博士的研究，澳洲华人人口的分布并不均衡，有一半以上的华人人口居住在悉尼，这也是大陆与香港移民最喜欢去的地方。^[11]因悉尼逐渐取代了墨尔本，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中心，因此吸引了许多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其结果是华语成为除了英语之外被最常使用的语言。然而，除了中国大陆移民之外，香港、台湾与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比较均衡地分布在澳洲各地。

新移民影响了华人族群所用的语言。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澳洲华人的主要语言是广东话，因为他们来自香港。但是随着新移民的到来，华语变成了澳洲华人之间最普遍的语言。近年来澳洲华人的教育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早期的澳洲移民是由劳工所组成，教育水平低；而新移

民则是由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所组成的，他们的教育程度高。不过，早期移民的子女也同样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

像上述几个国家一样，新移民在寻找工作时也遇到很多困难。这是因为他们掌握英语的能力比较低，而他们的专业文凭也不被承认；只有香港的移民，由于受英文教育，且文凭也得到承认，所以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并融入“主流社会”。根据 Li-Ju Chen 的研究^[12]，台湾的商业移民将妻子儿女留在澳洲，而他们自己则常常回台湾处理业务，因为他们发现，将本身的业务转移到澳洲相当困难。

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与上述几个国家不同，它没有实施过反华人移民的措施。此外，这是在诸国中华人人数百分比最高的国家。然而像上述四国一样，新加坡政府也尝试协助新移民，尤其是中华新移民。新加坡在独立初期实施家庭计划，限制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两个子女。这个家庭计划带来的结果是使新加坡华人的出生率逐渐下降，以致面临着人口老化的问题。因此，政府后来大幅度地改变其人口政策，鼓励并奖励年轻妇女生育，特别是对那些身在职场的母亲们，更给予优惠。此外，从 1990 年起，政府也落实了新移民政策，来吸引更多的外国移民，以便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所以，新加坡的居民从 1990 年的 3,047,100 人增加到 2009 年的 4,987,600 人。从 1968 年到 1989 年，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约两倍；而永久居民与非公民的人数则从 1990 年起急速增加。由于政府并没有公布相关统计数字，据估计，2009 年，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约有 30 万人。

表 5 新加坡华人人口情况表

年份	新加坡总人口	新加坡居民人口	居民中华人人口	占新加坡人口比率 (%)
1970	2,074,500	2,074,507	1,579,866	76.2
1980	2,413,900	2,413,945	1,856,237	76.9
1990	3,047,100	3,016,379	2,252,700	74.7
2000	4,027,900	3,273,400	2,513,800	76.8
2010	5,076,700	3,771,721	2,793,980	74.1

资料来源：Cheng Lim-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4; Lynn Pa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2nd edition),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2006, p. 200; Population Census of Singapore 2010,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s/themes/people/hist/popn.html> (accessed 5 January 2012).

像上述四国一样，新加坡的新移民一般与旧移民有别。旧移民多数来自福建、广东两省，同时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新移民则来自中国各地，其教育程度也较高，这使他们较容易离开新加坡，再到别处寻找工作。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在 105 个领取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有 74% 已经成为永久居民，但只有 1% 成为公民。^[13] 此外，他们当中的 51% 表示会在新加坡多住三到五年，30% 想回中国，29% 想再移民到其他国家。

虽然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人数众多，但是其人数并没有比在当地出生的华人为多。外地出生的华人约占新加坡华人总人口的 21% (2010 年的数据)，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在实施移民政策时注意族群的比例平衡，使新移民不会改变新加坡的族群结构。虽然如此，新移民跟新加坡华人构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这是由于两者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新移民的流动性与再度移民的特质致使他们不大容易融入新加坡社会。虽然如此，当地的许多宗乡会馆都积极协助新移民适应新加坡的环境，也请新移民出任他们的执委。政府也建立了国民融合理事会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来鼓励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

(二) “原住民国家”的新移民 (东南亚)

中华新移民除了前往发达国家之外，也移民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然而，与发

达国家不同的是，来到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很少是留学生（新加坡除外）。虽然发达国家有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但发展中的东南亚国家则缺乏准确的有关华人的统计数字（新、马除外）。这些国家中，对于新移民也没有特别的记录。根据庄国土教授的估计，东南亚约有 100 万新移民。应该说明的是，这些新移民不仅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原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人，也有一些进行再移民的。在东南亚的原住民国家中，为了减少华人人数，他们往往不大愿意接受中华新移民，而是接受非华人移民。由于族群的问题颇敏感，因此东南亚国家都没有公布有关移民的数字，这无形中使学术研究者分析移民问题时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以下的讨论，仅局限于华人人数的讨论，而不是涉及整个新移民的问题。但是，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类国家多数都不欢迎中华移民，因此，其新移民的数目要比移民国家少得多，而且以劳工、商务与非正式（非法）移民的人数居多。

在马哈迪首相主政的时代（1981—2003），马来西亚曾经实行新的人口政策，要把国家的人口从 1 800 万人增加到 7 000 万人，这个政策是在 1982 年巫统的会员大会上提出来的。他提出这个政策的理由是，马来西亚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就需要有大量的人口。不过，他没有说明预计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目标。有报导说，其目标定在 2020 年。如果这个新的人口目标是要以输入新移民作为其中的一个达成方法的话，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猜测，大部分的新移民人口将是马来人而不是华人。

表 6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情况表

年份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	占总人口百分比 (%)
1970	3 719 000	35.6
1980	4 415 000	32.1
1991	4 945 000	26.9
2000	5 692 000	24.4
2005	6 000 000	23.3
2010	6 451 300	24.6

资料来源：Tey Nai Peng, “Demographic Trends and Human Capital: The Case of Malaysian Chinese”, in Voon Phin Keong, ed., *Malaysian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Before Merdeka and Fifty Years After*, vol. 1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007, pp. 307 – 338 (especially p. 311); *Yearbook of Statistic Malaysia 2010*, http://www.statistics.gov.my/portal/download_Buku_Tahunan/files/BKKP/Buku_Tahunan_Perangkaan_Malaysia_2010.pdf (accessed 5 January 2012).

1984 年 4 月，马哈迪颁布休假法令给那些育有五个孩子的父母，希望这样的鼓励措施能够有助于达到 7 000 万人口的目标。但要达到上述目标，单靠生育是不可能的，所以，移民就变成了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马来西亚政府因此鼓励印尼原住民移入，直到他们发现印尼移民给当地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许多移民到马来西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些新印尼移民又不能够融入当地的马来社会。虽然马哈迪没有公开指明他要增加马来族群的人数，而使马来西亚的华人变成绝对的少数，但是，马哈迪的移民政策的确是增加了非华裔人口的百分比，因此使人觉得马哈迪时代并不鼓励中华新移民。2003 年继任的阿都拉巴达威首相以及现在的纳吉首相，也继承了与前任同样的移民政策。不过，庄国土教授估计，马来西亚约有 5 ~ 10 万的中华新移民，但是这个数字无法证实。

虽然华人在马来西亚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不过，其绝对值却仍然有所增加。在 1991 与 2005 年间，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增加了 100 多万人，马来西亚总人口中的 23% 为华人。这个增加应该是由于生育而不是外来移民所达致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也想削弱华人的经济力量，并且要华人融入原住民社会之中。1959年，当地政府颁布禁止华人在乡间从事商业活动的禁令，导致10余万华人离境。苏哈托总统上台后，颁布了全盘同化的政策，意图将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瓦解。1967年，他甚至中断中印（尼）外交关系，两国直到1990年才复交。此举也使中国人移民印尼的进程完全被截断。虽然如此，当地所谓的华人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苏哈托政府对北京采取敌视的态度，对印尼华人以及华族文化也采取不友善的态度。对于中国的“技术劳工”，也加以排斥。即使在中、印（尼）复交之后，1991年中国的技术劳工在印尼的 Indah Kiat 工厂工作时，他们仍然被印尼当局刁难，最后甚至被遣送回中国。^[14]

在苏哈托执政时期（1965—1998），许多华人遭到屠杀或者是被迫离境，但是大部分华人依然选择居留在印尼。苏哈托政府不但拒绝录用中国的技术人员，也拒绝接受中华新移民。虽然印尼采取了封闭的政策，然而非法的中华移民仍然进入印尼。苏哈托倒台后，非法的中国新移民继续流入，但笔者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随着全球化及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开始在印尼投资，中、印（尼）之间的友好关系致使更多的中国人访问印尼。他们当中有一些甚至在印尼居住了下来。印尼官方没有发表关于中国新移民的统计数字，庄国土教授估计约有10~12万人，但这个数字也无法证实。

应该指出的是，在2000年以前所进行的印尼人口普查中，没有关于族群（华人）的统计数字，即使是在2000年所作的人口普查，华人人口的统计也不很完整。由于很多华人都不承认自己是华族，所以当时纪录的华族人数，只占总人口的0.86%。其实，实际的数目可能介于1.2%~2.0%之间；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华族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1.2%，其实际数目可能还是在1.2%~2.0%之间。以下是有关印尼华人历年来的估计数字。

表7 印尼华人人口估计情况表

年份	印尼总人口	印尼华人人口	占总人口百分比 (%)
1961	97 020 000	2 425 500	2.5
1971	119 200 000	2 980 000	2.5
1990	178 000 000	3 560 000	2.0
2000	201 092 000	4 200 000	2.0
2010	237 556 000	4 751 112	2.0

注：起初，笔者对1971以及1990年华人人数的估计高了3%，这是因为当时印尼还没有包括族群背景的人口普查；现在，笔者将百分比减低，然而，这些数字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参见 Leo Suryadinata, *Pribumi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A Study of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Kuala Lumpur and London: Heinemann Asia, 1978, p. 96;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m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p. 7; Leo Suryadinata, "How Many Ethnic Chinese are there in Indonesia?" *Asian Culture* (Singapore), June 2004, pp. 63-74。有关2010年的华人人口，见 Jousairi Hasbullah, "Suku Jawa dan Tionghoa Mengapa Berkurang?" *Kompas*, 2 December 2011。

与印尼一样，越南也曾经实行反华人的政策。当南北越在1975年统一后，中、越两国关系恶化，河内政府也开始排斥华人。在对南方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新政府排斥华人资产阶级并且强迫所有华人变成越南的国民。许多华人被送进荒芜的新经济区域，开垦种地。一连串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导致华人大量离开越南。中越战争（1979年2月）后，有更多的越南华人离开越南。华人人口从1976年的123万人减少到1999年的86万人。不过，随着越南的改革开放，越南华人被欢迎回到越南协助发展这个国家。在此政策下，许多华人回到了越南。越南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但是没有相关资料。庄国土教授估计约有5~10万人，但是这个数字也无法证实。

表 8 越南华人人口情况表

年份	越南总人口	越南华人人口	占总人口百分比 (%)
1976	48 060 000	1 236 000	2.57
1979	52 741 700	935 074	1.77
1989	64 375 762	900 185	1.40
1999	76 323 173	862 273	1.13

资料来源: Ramses Amer, "Examining th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the Ethnic Chinese in Vietnam since 1954", in Leo Suryadinata, ed., *Migration,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Chinese Overseas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1, p. 187.

菲律宾政府没有公布过菲律宾华人人口的官方数字。菲律宾早期也曾经采取反华的政策。马科斯总统上台后,则采取了比较自由化的政策。在菲律宾与中国建交前,马科斯政府颁布新法令以简化华人加入菲律宾国籍的手续。然而,菲律宾对于华人移民的政策依然是非常谨慎的。菲律宾政府虽然提倡涵化政策,但中华文化在当地仍然是被容忍的。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中,非法的中国新移民流入菲律宾,给该国造成了一个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菲律宾的华人曾经向中国当局要求协助阻止非法移民的涌入,他们认为非法移民的到来影响了当地的华社与社会的安定。^[15]然而,菲律宾却没有这些新移民的统计数字。庄国土教授估计,进入菲律宾的新移民约有 15~20 万人,但这个数字也无法证实。

泰国则采取向中华移民门户开放的政策。虽然泰国实行的是同化政策,但是中华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能够保留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泰国的国家认同与华人的族群认同似乎没有激烈的冲突。而许多泰国华人也自愿认同于泰国主流的国家意识,因此即使是泰国的最高政治职位(首相)也可能由泰国华裔来担任。史金纳教授认为,泰国从来没有被殖民过,所以他们对自身的文化具有强烈的信心。^[16]

近二三十年来,很多泰国人涌到国外变成劳工。而中国人则涌入了泰国,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开始以后,许多中国人能够在东南亚获得更好的生活。Vorasakdi Mahatdhanobol 博士认为,2003 年,中国人合法移民泰国的大约有 12 万人。^[17]但是许多观察家却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移民在泰国的数目要比上述数字多得多,有些中国移民通过泰国转移到邻国,但是仍有不少继续留在泰国。这些新移民的到来,也给当地社会造成了新的问题。

三、境内外的中华新移民研究

(一) 境外的中华新移民研究

在新移民浪潮发生前,中华移民的去向以东南亚为主,约 90% 的境外华人聚居在东南亚。可是,新移民浪潮似乎改变了境外华人原有的图景。绝大多数华人新移民前往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移民的中心似乎由东南亚转移到了西方。然而,从总人口来说,东南亚华人人口至今仍占华人总数的 70%~75%。新移民的到来,对东南亚与西方国家华人社会(华社)的构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上文中提到的五个发达国家(碰巧都是“移民国家”)都吸收了大量的新移民,以便支持其经济活动。总体而言,它们所接受的新移民以技术和商务移民为主,尤其是中华移民。涌入这些国家的中华新移民多数具有较高的技术和教育水平。除新加坡外,这些新移民涌入上述发达国家以后,改变了在地国的华人人口构成,他们的百分比也超过在当地出生的华人。旧移民来自中国南方,而新移民则来自中国各地;旧移民以广东话作为共同语,新移民则以华语(普通话)作为共同语。但是,在“原住民国家”中,中华新移民占少数,所以其影响较小。

很明显,中华新移民对移民国家与原住民国家的冲击不同。前者的华社被重新“移民化”,

而后者的华社在面对这一冲击时仍然保留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在移民国家中，新移民有更多的文化上的自由；而在原住民国家，由于民族主义依然兴盛，新移民融入原住民主流社会的压力还很大。

作为新移民，他们都面对诸多困难。那些移入西方国家的移民在寻找工作时，遇到很多障碍，主要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学历不被在地国所承认。除了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许多新移民也面临着融入当地华人社会的问题。就算是新加坡，虽然这是一个华族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中华新移民依然有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庄国土教授所说的，“相对老移民，中国新移民更具开放性与多元意识，有更强的适应性和谋生能力，视跨国流动（甚至流回中国）为谋生和发展的常态，告别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传统移民心态”这一观察有关。^[18]由于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致使他们漂浮不定，无法融入在地国的社会，致使当地的居民对于新移民存有怀疑的态度，把他们看作只是来享乐，而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境外中华新移民的研究已经有些成绩，一般而言，研究发达国家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要比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数量多一些，素质也较好一些。其中原因可能主要是经费与资料的问题。研究发达国家的项目经费较多，资料也更丰富，统计数字也较可靠；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则经费较少，资料也不丰富，统计数字不大可靠，甚至没有统计数字可言。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个共同的问题：即非法新移民的存在。其实，这一类“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然而，其对华社的影响却不能被忽视。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在新移民研究中，这也是较弱的一环。此外，境外学者对跨国移民的比较研究也不多见。

这里，笔者简略地谈谈境外研究中华移民，包括中华新移民的几位学者。由于篇幅限制，只能举很有限的例子，因此，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就将此文当成是初步的结论吧！这些学者中，有本身就是旧移民或者新移民的，少数是在境外土生土长的学者。如澳洲的 Wang Gungwu (王赓武)^[19]，美国的 Ai Hua Ong (王爱华)^[20]、Bernard Wong (王保华)^[21]、Peter Kwong (邝治中)^[22]、Philip Kuhn (孔飞力)^[23]、Min Zhou (周敏)^[24]、Huping Ling (令狐萍)^[25]、Wei Li (李唯)^[26]，加拿大的 Peter S. Li (李胜生)^[27]，新西兰的 Manying Ip (叶宋曼瑛)^[28]，马来西亚的 Tan Chee Beng (陈志明)^[29]，他们都有专著问世，并且颇有见地。他们不但具有较深厚的专业学科背景与方法上的训练，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较丰富的资料，有一些也不乏统计数字，所以才有骄人的成绩。有些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突破，为移民现象的学术研究作出贡献。^[30]

此外，发达国家（许多是移民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许多是原住民国家）所关心的问题也略有不同。如果说“国族”或者“民族”建构已经不是发达国家学者主要的研究课题，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族与民族建构仍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新旧移民与国族建构也是东南亚学者所关注的研究课题。比如发达国家新加坡，由于建国的历史短，又处在“马来海洋”，所以依然重视“国族”建构。

此外，中国的崛起与新移民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也迥然有别。中国软实力的展示与新移民的涌入可能使许多国家的华人再度“华化”，这对中国与新移民吸纳国的关系会有一些影响，尤其是对于原住民国家，其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个课题值得再深入研究。

同华侨华人研究一样，有关新移民研究一般都是“国别研究”而不是“跨国研究”。其实，这是在区域研究中所出现的普遍现象。许多学者，包括王赓武教授，其实也大力提倡跨国研究（比较研究）。可是，由于跨国研究的诸多困难，致使许多学者望而却步，无法做到。学者间如果能够有合作的项目，应用共同的理论架构，跨国研究是可以实现的。

研究全球化的新移民对于华侨华人的研究理论到底有多重要？中华新移民的研究其实是“华侨华人研究”的组成部分，不能孤立起来看。由于中华新移民这一现象出现时间还比较短，所以其长远的影响尚未知晓。如果大部分的新移民真的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而变成一种“游

离群体”，对于吸纳国没有归属感，那么，它对于我们所知道的华人移民的理论会有不同的启示。这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二）中国的中华新移民研究

中华新移民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它是华侨华人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大陆学者中，研究中华移民，尤其是新移民的不乏其人。不过，与国外学者相似的是，这些学者并不只是研究中华新移民，他们一般说来是研究华人社会，或华人历史，或华人移民的课题。不过，他们也发表有关新移民的论文。笔者对中国学者没有作深入的研究，这里仅列举所知道的几个学者作为例子，可以说有点片面。这些学者包括周南京^[31]、庄国土^[32]、李明欢^[33]、丘立本^[34]、李安山^[35]、高伟浓^[36]、李其荣^[37]与程希^[38]，等等。这些学者都有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探讨有关移民（包括新移民）的课题，其中有谈移民理论的，有分析中国移民政策的，有研究侨乡的，也有写迁移到西方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的。这些论文宏观论述多于微观论述，只有一些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其实，《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对于新移民的问题相当关注。^①根据笔者的估计，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中，该杂志总共发表了341篇论文。其中有39篇与新移民有关，约占论文总数的11.4%。^②

大陆学者在研究华人移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李明欢教授有关欧洲华人移民以及侨乡的研究，由于引用第一手资料，又应用社会学的方法，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可是，大陆学者在华侨华人研究，尤其是移民（新移民）方面的研究，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其实，新移民的议题是华侨华人问题的一部分，大陆学者曾在2006年12月召开探讨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全国会议，指出其长处与短处，其中也讨论移民与新移民问题，许多见解至今依然有效。^[39]

在笔者的印象里，有些大陆学者在中国境外所做的田野调查还远远不够，有时对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如当地语文）也不足，调查时间太短，甚至也有完全没有做田野调查的，这些都影响了研究的水平。依笔者的浅见，大陆学者除了应该继续做有关移民理论的研究并加强田野调查工作外，也可以更加集中地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研究中国新移民的发源地、“新归侨”、中国移民的人数及背景等，这些项目都是外国学者比较难以与大陆学者竞争的，因为大陆学者有资料上的优势。有关新旧归侨以及留学生的研究，包括他们对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思想与科学发展的影响，也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笔者也发现，研究中华移民的大陆学者，一般都用中文写论文；具有双语能力的学者应该也用英文发表作品，同时也应该将优秀的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以便能够走出龙的世界。

四、结 语

中华新移民是在20世纪末才开始出现的现象。然而，新移民的问题不能孤立起来看，它是长期中华移民的一部分，也是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环节。然而，全球化中的移民，就必须以全球的视野来了解与分析；所在国（吸纳国）的视野也不能忽视。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排斥中国移民的记录，可是“移民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改变其移民政策，欢迎中华移民；而“原住民国家”，对中华移民依然实施不同程度的谨慎保守的移民政策。不同类型的吸纳国实行不同的政策，而移民对于吸纳国也具有不同的冲击与影响。移民吸纳国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遇到不同程度的因新移民而产生的问题。非法移民问题在有些国家中也颇严重，

^① 除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外，当然也有其他杂志刊登有关新移民的论文（例如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广东《侨史》学报），由于时间所限，没有列入本文中讨论。此外，厦门大学也有“新移民研究”项目，可惜笔者没有机会拜读有关的出版物。

^② 这是笔者粗略的计算，仅供参考。

因而在这方面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

中国的移民政策以及吸纳国的政策会不会改变？依笔者看来，中国现行的移民政策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每年都有几百万新的劳动力投入市场，中国境内不可能全部加以吸收，加上有些中国人积累了财富，也会向外发展投资。境外诸国，有些还能继续吸纳新移民，有些则已饱和。新移民的到来产生了政治与社会问题，所以，这些国家也开始实施诸多限制，以减少新移民。这些新移民，对于吸纳国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这可能因国而异，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一般说来，吸纳国的民众面对新移民的竞争，往往对新移民有反感，他们并没有看到新移民所做出的贡献。新移民的“离群索居”，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有些新移民不在基础企业投资，在地国的民众因此无法享受移民投资的成果，这也往往使在地国民众产生反移民的情绪。新移民“浮萍无根”的心态，也可能引起在地国民众的不满。

新移民的“浮萍无根”与以前的“落叶归根”及“落地生根”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与现象。这在中华移民史上，甚至世界移民史上，是不是新的概念与现象？以往，这种概念与现象是不是也曾经存在过？这三种概念与现象是不是曾经同时存在过，但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其中一种概念与现象特别突出？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大陆及境外学者，对于中华移民问题的研究，包括新移民的研究，都有关注。境外的学者，由于起步较早，加上环境条件和经费与方法上的优势，因此有比较显著的成绩。不过，大陆学者也在迈步前进，迎头赶上。在发展华侨华人研究，包括中国新旧（老）移民的研究上，需要大陆与境外学者的合作，以便能够更紧密地交流，取长补短。即使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语言也需要双语（普通话与英语），以便能够与不谙中文的学者沟通。境外与大陆学者的优秀论文，也应该翻译成中英文，以互相借鉴。

[注释]

- [1]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Wang Gungwu,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 54 - 72 (especially p. 56).
- [2] 庄国土 《中国新移民与东南亚华人文化》，*CHC Bulletin*, issue 9, May 2007, p. 9.
- [3] 庄国土 《中国新移民与东南亚华人文化》，*CHC Bulletin*, issue 9, May 2007, pp. 8 - 10; 张秀明在 2001 年的文章中将中国新移民分成以下五类：1. 家庭团聚类移民；2. 留学移民；3. 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4. 劳工移民；5. 非法移民。见《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 3 月，第 22 ~ 27 页。庄教授没有将技术移民与劳工移民列入。
- [4] Dexter Roberts and Jasmine Zhao, "China's Super-Rich Buy a Better Life Abroad", *Bloomberg Businessweek*, November 28-December 4, 2011, pp. 15 - 16.
- [5] 庄国土 《中国新移民与东南亚华人文化》，*CHC Bulletin*, issue 9, May 2007, p. 9.
- [6] Guo Shibao, "Return Chinese Migrants or Canadian Diaspora?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Canadians in China", in Leo Suryadinata, ed., *Migration,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Chinese Overseas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pp. 297 - 320.
- [7] [8] 周兆呈 《美国亚裔研究学者周敏：模范少数族裔另一种排外机制》，《联合早报》2011 年 4 月 10 日。
- [9] Phoebe Li, "Chinese Immigrants to New Zealand: A Profile of the PRC Inflow", in *Asian Culture*(《亚洲文化》), No. 34 (June 2010), pp. 59 - 82.
- [10] Paul Merwood, "Studying and Staying on in New Zealand", Wellington, Department of Labour, 引自 Phoebe Li 上引文。
- [11] Christine Ingl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Australia", in Leo Suryadinata and Lee Guan Kin, ed., *Chinese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and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2009, pp. 29 - 52.
- [12] Li-Ju Chen,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Taiwanese Immigrant Identity", in John Docker and Gerhard Fischer ed., *Race, Colour & Identity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Ltd, 2000,

pp. 131 – 142.

- [13] 李元瑾 《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从“新客”到“新移民”》，李元瑾、廖建裕主编 《华人移民比较研究：适应与发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华裔馆，2010年，第161~181页。
- [14] Leo Suryadinata, *Politik Luar Negeri Indonesia di Bawah Soeharto*, Jakarta: LP3ES, 1998, pp. 148 – 149.
- [15] 菲律宾学者兼社会活动家洪玉华女士认为，中国非法移民“贿赂警察，抢人饭碗”，干扰华社，又破坏了华人的形象，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有关她的谈话，见“中国新移民的影响不能忽视：访菲华博物馆馆长洪玉华（一）”，郑昭贤著 《东南亚华人精神坚韧不拔》，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9，第130~133页；有关新移民对菲律宾的影响，也请参阅 Teresita Ang See, “Influx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Mette Thuno, ed., *Beyond Chinatown: New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a*, Copenhagen: NIAS, 2007, pp. 137 – 162.。
- [16] G. William Skinner,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 *Nanyang Xuebao (南洋学报 South Seas Society Journal)*, Parts 1 – 2 (1960), pp. 86 – 100.
- [17] David Fullbrook,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 Power of Guanxi”, *Asia Times*, 30 July 2004 “Overseas Chinese: An Annotated List of Internet Resources”, newton. uor. edu/... /Asian studies Dept/China-huaqiao.html (access on 5 January 2012).
- [18] 庄国土 《中国新移民与东南亚华人文化》，*CHC Bulletin*, issue 9, May 2007, 第10页。
- [19] 王赓武教授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在此，笔者仅列举其三篇与新移民有直接关系的论文：Wang Gungwu,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 3 – 31;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Wang Gungwu,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 54 – 72 “New Migrants: How New and Why New?”, in *Asian Cultu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No. 26 (June 2002), pp. 1 – 12.
- [20] Ong Ai Hu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egacy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这是王爱华教授最常被人引用的理论性专著。
- [21] Bernard Wong,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Boston: Allyn & Bacon, 1998; *Patronage, Brokerage, Entrepreneurship & Chinese Commun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AMS 1988 “The Chinese in New York City: Kinship and Immigration”, Francis Hse and Hendrick Serrie, ed., *The Overseas Chinese: Ethnicity in National Context*,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pp. 143 – 172.
- [22] Peter Kwong, *Chinese America: The Immigrants Experience*, New York: Universe, 2000, co-author; *Forbidden Workers: 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 [23] Philip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The Three Cultures of Migration”, in Leo Suryadinata, ed., *Migration,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Chinese Overseas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1, pp. 39 – 54.
- [24] Min 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merica*, Temple University, 2006.
- [25] Huping Ling, *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2004); *Emerging Voices: Experiences of Underrepresented Asian Americans* (2008); and *Chinese Chicago: Rac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 (2011).
- [26] Wei Li, *Ethnoburb: The New Ethnic Community in Urban Americ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 [27] Peter Li, “Immigration from China to Canada: Issues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Human Capital”, in Leo Suryadinata, ed., *Migration,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Chinese Overseas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1, pp. 73 – 95; *Destination Canada: Immigration Debates and Issues*, Oxford, 2008; *The Chinese in Canada*, Oxford, 1998, 2nd edition.
- [28] Manying Ip, *Being Maori Chinese*,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8 “Locating Chinese New Zealanders: Contemporary ‘Quality Migrants’ and ‘Yesterdays’ ‘Undesirable Aliens’ Compared”, in Leo Suryadinata and Lee Guan Kin, eds., *Chinese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2010, pp. 53 – 67.

- [29] Tan Chee Beng, “Cultural Reproduction, Local Inven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Food”, in Tan Chee Beng ed., *Chinese Food and Foodways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ingapore: NUS Press, 2011; “Migration, Localiz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Global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Overseas”, in Leo Suryadinata, ed., *Migration,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Chinese Overseas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1, pp. 15 – 38; Tan Chee Beng, *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0] 有关移民的一些新理论, 有些与华侨华人有直接关系。林大伟 (Lim Tai Wei) 教授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有简单的分析。Lim Tai Wei, “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itizenry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Selected Regions of the U. S.”, in Leo Suryadinata, ed., *Migration,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Chinese Overseas and Globalizatio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1, pp. 132 – 148.
- [31] 周南京教授著作甚丰, 在此, 仅列举其两本与移民及新移民有关的主要出版物 《华侨华人问题概论》, 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 《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 香港: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5 年。他有关华侨华人同化问题以及国籍问题的研究与新移民研究息息相关。
- [32]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广东高教出版社, 2001 年 《海峡两岸与东南亚: 当代华商经贸网络》, 台北: 稻香出版社, 2003 年 《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33] 李明欢 《欧洲的东南亚华裔与海洋亚洲》,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国际移民学研究: 范畴、框架及意义》, 《厦门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福建侨乡调查: 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欧洲华侨华人史》,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 “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34] 丘立本 《从世界看华人: 华侨研究新探》, 香港: 南岛出版社, 2000 年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国际移民: 兼论中国移民的生存发展空间》,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 《国际移民趋势, 学术前沿动向与华侨华人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 [35] 李安山 《非洲华侨华人史》,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年;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数统计》,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 [36] 高伟浓 《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 《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生存适应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 [37] 李其荣 《美国现代化与华人社会的调适》(合著), 《世界民族》1997 年第 2 期 《华人新移民与后工业美国社会——兼论“模范少数族裔理论”》, 《世界民族》2001 年第 3 期 《整体性与多样性的混合——美国的中国移民与意大利移民的比较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 [38] 程希 《当代中国留学生研究》,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
- [39] 参见吴小安、吴杰伟主编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优势与挑战》, 香港: 文汇出版社, 2008 年。